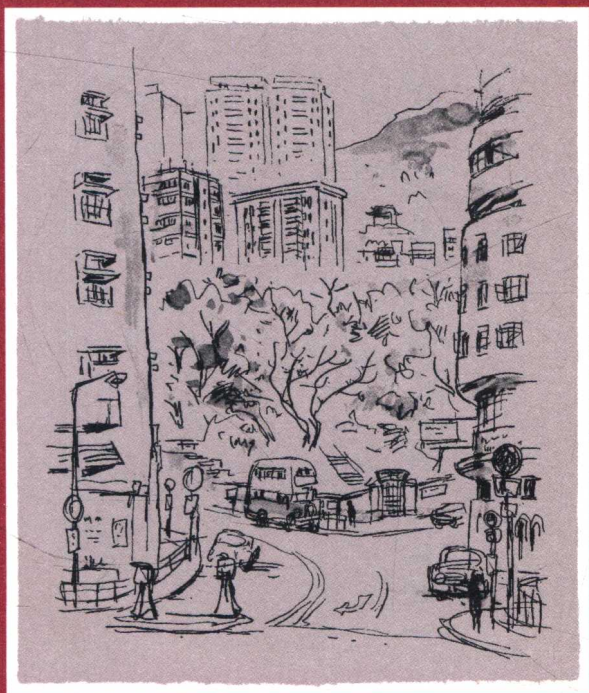


# 香港的抒情史

陳國球

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

# 香港的抒情史

陳國球 著



中文大學出版社

**《香港的抒情史》**

陳國球 著

© 香港中文大學 2016

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。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，不得在任何地區，以任何方式，任何文字翻印、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。

國際統一書號 (ISBN) : 978-962-996-743-7

出版：中文大學出版社

香港 新界 沙田 · 香港中文大學

傳真：+852 2603 7355

電郵：cup@cuhk.edu.hk

網址：www.chineseupress.com

***Hong Kong in Its History of Lyricism*** (in Chinese)

By Leonard Kwok Kou Chan

©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

All Rights Reserved.

ISBN: 978-962-996-743-7

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Sha Tin, N.T., Hong Kong

Fax: +852 2603 7355

E-mail: cup@cuhk.edu.hk

Website: www.chineseupress.com

Printed in Hong Kong

# 香港的抒情史

## 自序

「香港」，由無名，到「香港村」、「香港島」，到「香港島、九龍半島、新界和離島」合稱，經歷了政治地理的不同界劃，經歷了一個自無而有，而變形放大的過程。重要的是，「香港」這個名稱底下有「人」；有人在這個地理空間起居作息，有人在此地有種種喜樂與憂愁、言談與詠歌。有人，有生活，有恩怨愛恨，有器用文化，「香港」的意義才能完足。

要理解「香港」，不能單憑「香港人勤奮工作，應變靈活，悉心戮力發展經濟，成為國際商貿中心」，這幾句官方門面話；或者「香港，是一個畸形兒——富麗的物質生活掩蓋著貧瘠的精神生活」，那種居高臨下的譏諷與嘲笑。種種現象，其背後總有其文化政治的脈絡、春秋歲月的前後關聯。處於今日，或者我們有種責任，打開歷史通道，探看這個由「殖民地」到「特別行政區」，上上下下競以「忘情」隱沒身世的都市。總有些人希望「香港」只活在當下，遺落過去，沒有記憶、沒有「我」。

這本書以「抒情」為題，是因為我相信香港還是有情；情所棲遁處，就在於可以載心的香港文學。這本書也是我對「抒情傳統」思考

的延續。我以為從屈原《楚辭·惜誦》的「惜誦以致愍兮，發憤以抒情」開始，到陳世驥於1971年發表〈論中國抒情傳統〉（“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”），從「抒情」到「抒情論」，可見「情」之「抒」（或作「杼」、「舒」、「紓」），牽涉到內與外、心與物、主體精神與現實世界之間的互動，是一個雙向的過程。抒情不僅僅是抒發私我的牢騷、單向的夢囈，而是個體與外界透過某種渠道與形式的溝通與協商。「香港文學」的真義，在於身處這個地理空間的人，如何與圍繞他的時空周旋對話；情牽兩端，形諸言語文字，一個名為「香港」的「地方」由是生成。

本書各章分成三輯：〈走進文學史〉、〈可記來時路？〉，與〈申旦抒中情〉。

這幾年來，我和朋友合力彙集整理早期香港文學的資料，編成《香港文學大系1919-1949》十二卷。這是一項「抗拒遺忘」的工程；其成效如何，還要等待時間長河的淘洗。本書各章的構思，也出於同一種想望。「走進文學史」一輯的文章，包括我為《大系》寫的〈總序〉，試圖說明「文學大系」作為「香港文學的過去」之承載體的可行性，以及所謂「香港」、所謂「香港文學」，究竟應如何定義與劃界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，為香港政權轉換的「正當性」作說明的「中國文學史」書寫忽然湧現，〈中國文學史視野下的香港文學〉對這個現象作出一些觀察與評論。另一方面，海峽的對岸，也在八十年代開始，對「香港文學」作為一個整體概念有所關注，〈臺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〉主要析述這份關懷的前後因緣。至於同期的本土論述，我以香港文化人葉輝之說作樣本，寫成〈書寫浮城的文學史〉一章。這幾篇文章可說是時光通道的尋覓與辨識。本輯最後一章〈詩裏香港〉，以殖民地總督履任時寫的一首詩開篇，殖民者下旗撤返之際一位學者

詩人應和之詩作結，記錄了我個人疏鑿「詩之通道」的嘗試。

本書第二輯〈可記來時路？〉代表回望過去，油然而生的一種「焦慮」。論李碧華一章就以此為題，她以最貼近民心脈動的筆墨寫成《胭脂扣》等小說；從來就重視合約精神的香港，居然在歷史轉折關頭，對種種承諾諸多疑慮。這些八、九十年代的疑問，到今天，消除了沒有？「來時路」本是回憶的依據。在「香港」作文化追憶，居赫赫之勢的路標，正是「中國」二字；〈承納中國，建構虛幻〉、〈情迷中國〉二文，意在為香港千種萬種「單思」診察脈象。本輯另外三章〈「畸形香港」〉、〈香港文學的「曾經」與「可能」〉、〈「選學」與「香港」〉，則是對「來時路」的細端詳；前兩章從不同角度解說早期香港文學評論所展現的文化空間與視野；後者以二十一世紀以前的香港小說選集為討論對象，除了實錄以存史之外，還想從中探測「文學香港」意識的浮現。

第三輯〈申旦抒中情〉選樣討論在香港這個地方出現的「抒情論」。〈放逐抒情〉一章重點析述中國現代抒情詩人徐遲因為逃避戰禍來到香港，在個人詩學蛻變的過程中，重新提出「詩與政治」的議題，引發當時中國文學界對「抒情」之義的論爭。〈抒情 在彌敦道上〉則以兩個香港文學文本交叉對照；一篇是「初到貴境」的南來文化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所寫的散文，另一篇是本土作家在廿一世紀初「詠懷古蹟」的新詩；兩者都以同時代的彌敦道——九龍半島貫通南北的一條重要街道——為題材，但情感投射的方式則不一。其餘兩章以通俗文化中的「雅文本」為論：《客途秋恨》講落拓才子懷想青樓舊愛，原是最濫情感傷的曲文，緣何百年前的秋涼月色，還灑落在今日窗櫺？唐滌生《帝女花》則寫明朝末年甲申之變公主與駙馬殉情殉國，

究竟在國家政治的重壓之下，人情有沒有進退頹頹的空間？這都是可供思考的問題。

本書三輯各章並不構成線性敘述的「香港抒情史」，而旨在考掘各種進路，走入「文學香港」，研詰其中「抒情」的史蹟。因為此間有情、有文學，才有「香港」的歷史，「香港史」才值得書寫。

2016年8月21日八仙露屏下



# 目 錄

自序 / vii

## 一 走進文學史

1. 香港？香港文學？——《香港文學大系 1919-1949·總序》 / 3
2. 中國文學史視野下的香港文學——「香港」如何「中國」 / 37
3. 臺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 / 73
4. 書寫浮城的文學史——論葉輝《書寫浮城》 / 97
5. 詩裏香港——從金制軍到也斯 / 127

## 二 可記來時路？

6. 文學評論與「畸形香港」的文化空間  
——《香港文學大系 1919-1949·評論卷一》導言 / 149
7. 承納中國，建構虛幻——香港的現代文學教育 / 193
8. 「選學」與「香港」——香港小說選本初探 / 227
9. 情迷中國——香港五、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運動面向 / 261

10. 可記來時路？——文學香港與李碧華 / 311

11. 香港文學的「曾經」與「可能」  
——香港早期文學評論的流轉空間 / 333

### 三 申旦抒中情

12. 抒情 在彌敦道上 —— 香港文學的地方感 / 3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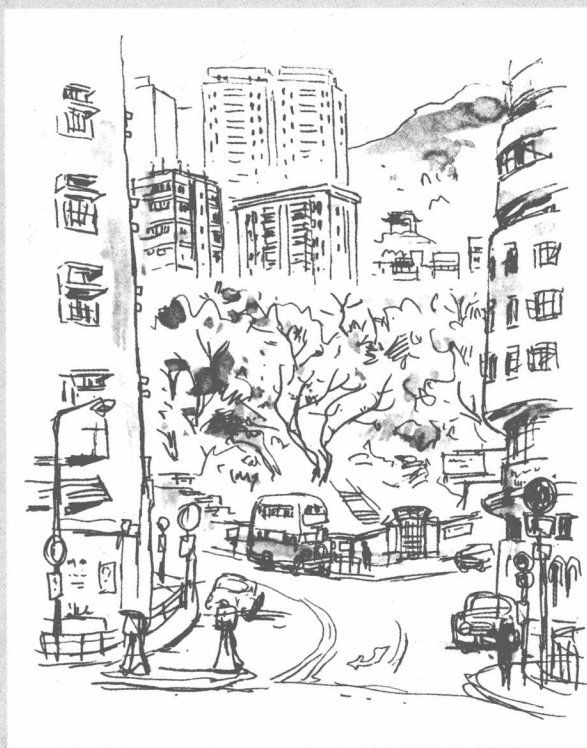
13. 政治與抒情 —— 論唐滌生的《帝女花》 / 367

14. 涼風有信 —— 《客途秋恨》的文學閱讀 / 397

15. 放逐抒情 —— 從徐遲的抒情論說起 / 413

# 1

## 走進文學史





# 1. 香港？香港文學？

## ——《香港文學大系 1919-1949·總序》

香港文學未有一本從本地觀點與角度撰寫的文學史，是說膩了的老話，也是一個事實。早期幾種境外出版的香港文學史，疏誤實在太多，香港文藝界乃有先整理組織有關香港文學的資料，然後再為香港文學修史的想法。由於上世紀1930年代面世的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被認為是後來「新文學史」書寫的重要依據，於是主張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聲音，從1980年代開始不絕於耳。<sup>1</sup>這個構想在差不多三十年後，首度落實為十二卷的《香港文學大系 1919-1949》。際此，有關「文學大系」如何牽動「文學史」的意義，值得我們回顧省思。

### 一 「文學大系」作為文體類型

在中國，以「大系」之名作書題，最早可能就是1935至1936年出版，由趙家璧主編，蔡元培總序，胡適、魯迅、茅盾、朱自清、周作人、郁達夫等任各集編輯的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。「大系」這個書業用語源自日本，指匯聚特定領域之相關文獻成編以為概覽的出版物：「大」指此一出版物之規模；「系」指以「時」聯系或以「體」聯系。<sup>2</sup>趙家璧在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出版五十年後的回憶文章，就提到他以「大系」為題是師法日本；他以為這兩字：

既表示選稿範圍、出版規模、動員人力之「大」，而整套書的內容規劃，又是一個有「系統」的整體，是按一個具體的編輯意圖有意識地進行組稿而完成的，與一般把許多單行本雜湊在一起的叢書文庫等有顯著的區別。<sup>3</sup>

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出版以後，在不同時空的華文疆域都有類似的製作，並依循著近似的結構方式組織各種文學創作、評論以至相關史料等文本，漸漸被體認為一種具有國家或地域文學史意義的文體類型。<sup>4</sup>資料顯示，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繼作有：

丁景唐主編：《中國新文學大系 1927-1937》

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84-1989年）；

孫頤、江曾培等主編：《中國新文學大系 1937-1949》

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90年）；

馮牧、王蒙等主編：《中國新文學大系 1949-1976》

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97年）；

王蒙、王元化總主編：《中國新文學大系 1976-2000》

（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2009年）。

另外也有在香港出版的：

常君實、譚秀牧主編：《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 1928-1938》

（香港：香港文學研究社，1968年）。

在臺灣則有：

余光中等主編：《中國現代文學大系》（1950-1970）

（台北：巨人出版社，1972年）；

司徒衛等主編：《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》（1949–1979）

（台北：天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1979–1981年）；

余光中總編輯：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——臺灣1970–1989》

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1989年）；

余光中總編輯：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（貳）——臺灣1989–2003》

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03年）。

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地區有：

方修編：《馬華新文學大系》（1919–1942）

（新加坡：世界書局／香港：世界出版社，1970–1972年）；

方修編：《馬華新文學大系（戰後）》（1945–1976）

（新加坡：世界書局，1979–1983年）；

李廷輝等編：《新馬華文文學大系》（1945–1965）

（新加坡：教育出版社，1971年）；

雲里風、戴小華總編輯：《馬華文學大系》（1965–1996）

（新山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，2004年）。

內地還陸續支持出版過：

方修編：《戰後新馬文學大系》（1945–1976）

（北京：華藝出版社，1999–2001年）；

新加坡文藝協會編：《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》

（北京：中國華僑出版公司，1991年）；

于華、馬文蔚等主編：《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大系》

（北京：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1993年）等。

其他以「大系」名目出版的各種主題的文學叢書，形形色色還有許多，當中編輯宗旨及結構模式不少已經偏離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的傳統，於此不必細論。

### (一)「文學大系」的原型

由於趙家璧主編的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正是「文學大系」編纂方式的原型，其構思如何自無而有，如何具體成形，以至其文化功能如何發揮，都值得我們追跡尋索，思考這類型的文化工程的意義。在時機上，我們今天進行追索比較有利，因為主要當事人趙家璧，在1980年代陸續發表回顧編輯生涯的文章，尤其文長萬字的〈話說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〉，除了個人回憶，還多方徵引紀錄文獻和相關人物的記述，對《新文學大系》由編纂到出版的過程有相當清晰的敘述。<sup>5</sup>後來不少研究者如劉禾、徐鵬緒及李廣等，討論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的編輯過程時，幾乎都不出《編輯憶舊》一書所載。<sup>6</sup>在此我們不必再費詞重複，而只揭其重點。

首先我們注意到作為良友圖書公司一個年輕編輯，趙家璧有編「成套文學書」的事業理想；同時，身為商業機構的僱員，他當然要照顧出版社的成本效益、當時的版權法例，以至政治審查等種種限制。<sup>7</sup>從政治及文化傾向而言，趙家璧比較支持左翼思想，對國民政府正在推行的「新生活運動」，以至提倡尊孔讀經、重印古書等，不以為然。因此，他想要編集「五四」以來的文學作品成叢書的想法，可說是在運動落潮以後，重新召喚歷史記憶及其反抗精神的嘗試。<sup>8</sup>

在趙家璧構思計劃的初始階段，有兩本書直接起了啟迪作用：阿英（錢杏邨）介紹給他的劉半農編《初期白話詩稿》，以及阿英以筆名「張若英」寫的《中國新文學運動史》。前者成了趙家璧「理想中的那



本『五四』以來詩集的雛形」，後者引發他思考：「如果沒有『五四』新文學運動的理論建設，怎麼可能產生如此豐富的各類文學作品呢？」由是，趙家璧心中要鋪陳展現的不僅止是歷史上出現過的文學現象，他更要揭示其間的原因和結果；原來僅限作品採集的「『五四』以來文學名著百種」的想法，變成「請人編選各集，在集後附錄相關史料」的比較立體的構想，再進而落實為「一套包括理論、作品、史料」的「新文學大系」。《史料集》一卷的作用主要是為選入的作品佈置歷史定位的座標，提供敘事的語境；而「理論」部分，因為鄭振鐸的建議，擴充為《建設理論集》和《文學論爭集》。這兩集被列作《大系》的第一、二集，引領讀者走進一個文學史敘事體的閱讀框架：新文學好比這個敘事體中的英雄，其誕生、成長，以至抗衡、挑戰，甚而擊潰其他文學「惡」勢力（包括「舊體文學」、「鴛鴦蝴蝶文學」等）的故事輪廓就被勾勒出來。其餘各集的長篇〈導言〉，從不同角度作出點染著色，讓置身這個「歷史圖象」的各體文學作品，成為充實「寫真」的具體細部。

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的主體當然是其中的《小說集》、《散文集》、《新詩集》和《戲劇集》等七卷。劉禾對《大系》作了一個非常矚目的判斷；她認定它「是一個自我殖民的規劃」（“self-colonizing project”），證據之一是《大系》按照「小說、詩歌、戲劇、散文」的文類形式四分法（“four-way division of generic forms”）組織「所有文學作品」，而這四種文類形式是英語的“fiction”，“poetry”，“drama”，“familiar prose”的對應翻譯，《大系》把這種西方文學形式的「『翻譯』的基準」（“‘translated’ norms”）典律化，使自梁啟超以來顛覆古典文學之經典地位的想法得成具體（crystallized）；所謂「自我殖民化」的意思是，趙家璧的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視西方為「中國文學」意義最終解釋的根據地。<sup>9</sup>衡之於當時的歷史狀況，劉禾這個論斷應該是一種非常過度的詮釋。首先西